



汉赋与经学

冯良方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汉赋与经学

冯良方◎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赋与经学/冯良方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8

ISBN 7-5004-4685-3

I. 汉… II. 冯… III. 汉赋—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6055 号

责任编辑 树 琦

责任校对 王 芳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京南印刷厂

装 订 桃园兴华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25

插 页 2

字 数 310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十余年前的一天，我的同事吴明贤教授送来一篇文章，作者是他指导过的硕士研究生。

我首先为《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现代汉赋研究的历史透视，兼谈古代文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这样的题目所吸引。题目涉及的三部赋学著作有马积高先生的《赋史》、龚克昌先生的《汉赋研究》——两位先生都是我尊为师长的赋学前辈，此外便是拙作《汉赋通论》。著作既已出版，便想听取意见。我一口气读完文章，作者思想的敏锐，立论的峻直，文笔的畅达，立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同时又生出一些顾虑：既为书评，褒贬在所难免；而作者的批评，偏又锋芒毕现。为稳妥起见，我请托吴教授向作者转达我的建议：文章发表前，能否将一些措辞“软化”。这样的建议，显然关乎世故。

后来这篇文章发表没有，我至今也不知道，但作者冯良方的名字却从此留在我的记忆里。他通过文章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年轻气盛、放言无惮的才子。

2002年的春天，我因事去昆明，意外地遇到良方。乍一见面，才发现与我想象差得太远。他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朴实而

内敛，毫不张扬。此后稍加接触，又感受到从他身上透出的四川人的灵秀之气。在以后的两三天的交往中，居然从他的说话中听出些许的昆明口音，更从他红黑的脸膛，感受到云贵高原赋予他的执着与倔强。他告诉我，从母校四川师大毕业后，先到云南教育学院执教，后来又调到云南大学中文系。辞赋依然是他的研究方向，但目前在做什么课题，他却只字未提。

以文章神交十余年，相逢不过短短三日。离别以后，一晃两年过去，突然接到他托人捎来的大作《汉赋与经学》，嘱我作序。我不敢为人作序，不仅是怕被人讥为攀龙附凤，沽名钓誉，更是因为生性疏懒，怕不能读完全书，说些无聊的应酬话。但对于良方的要求，我却不能犹豫。一来是曾经有一段以文相交的缘分，二来是在拙作《汉赋通论》中，正好有一章是《汉赋与汉诗、汉代经学》。有以上两点理由，聊可自慰，我欣然答应写序。

二

拙作是在我的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其撰写距今已有二十二年，出版距今已有十五年。回忆当年写作的目的，在相当程度上是有感于在过去的文学史的研究当中，每论及作者的阶级立场、哲学观和人生观与其创作的关系，犹如两股道上的车，往往是一步跨过，根本无视两者间还有作为逻辑过程的中介存在。如当时通行文学史中一说到庄子的哲学与文学，论者对存在其间的联系并无逻辑的展示。究其本质，这种现象乃是极端政治在学术上的表现。极端政治之影响于学术，最终导致无视中介的思想方法与研究方法产生，从而以当时习以为常的政治定性方式，为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定性。20世纪50年

代以来学术领域简单化乃至粗暴化的倾向，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此而来的。尝试纠正这样的倾向，是我当时撰写论文的指导思想。这种尝试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赋家地位与赋的繁荣》与《汉赋与汉诗、汉代经学》两章之中。

自汉代在秦的基础上确立了中央集权之制，思想的建设始终是帝王关注的重大问题。而这个问题最终是依赖经学得以完成。天人感应说是经学的核心思想。汉儒认为，在宇宙之中，人无论其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应与天地同构。但人道与天道、地道如三条平行线，本不相交；芸芸众生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沟通天地之道。于是在三者之间乃有了一条竖线，它与三条平行线构成一个大写的“王”字，“王”字的象征意义在于，能够贯通天、地、人三道的，惟有王道。普通人不能自达于天道，却可以通过“以人随君，以君随天”，而进入人天契合的境界。可见论证世俗王权的合法性与神圣性，是这个理论构架的价值所在。

然而就社会的整体利益而言，王权不能处于完全没有限制的状态。在“王”字中间一竖的两翼，汉儒另设置了两条竖线，一条是儒学经典、一条是祥瑞灾异。儒学经典是圣人“奉天法古”之作，是天地意志的文献载体。祥瑞灾异虽为自然万象的变化，却是天地意志的形象显示。对帝王而言，儒学经典与祥瑞灾异是两面刃，它既为君权的合法性辩护，也限制着帝王行事的任意性。王者行事，不能违背儒学经典与祥瑞灾异的指示，否则便是违背了天地的意旨。以人与天、地相配为背景，以服务于王权为旨归，以经典、灾异为辅翼，构成汉代政治制度与文化思想同构的经学体系。这个体系的建立，是通过经传注疏的演绎。所以，儒学经典在汉代经学体系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此，以从政为主要人生价值所在的文人，其生活在汉代，一切政治与文化的活动都不能不接受经学的思想规范。刘向《条灾异封事》以西周、春秋、战国及秦朝史事为鉴，杂引《诗》十四条、《易》四条、《论语》一条及《春秋》所言灾异，结合当时自然异象。反复论证，意在揭露时弊，发人警醒。刘向之文，以所论之事为核心，以经典、灾异、史事为论据，形成循环往复的封闭式结构，可为汉代文章经学化的代表。作为经国治世工具的文章，受到经学的深刻影响，应为题中之义。而赋作为汉代的纯文学形式，经学对它的影响则不可能如此地显露。展示经学之影响于辞赋的方式与途径，乃成为赋学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和重点。为此我在《汉赋通论》中特设了《汉代赋家的地位》一章，从汉代的选士制度以及汉赋在汉代的地位入手，讨论汉诗、汉赋与汉代经学的关系，进而探讨经学与辞赋之间的中介联系。

拙作出版以后，自己对上述问题解决得怎样，心里并不踏实。我多次想利用出修订本的方式，对上述问题继续作深入研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良方的大作，耿耿心事，才终于有了着落。

三

良方的大作（以下简称“冯著”），从汉赋与汉代经学“同体共生”的关系入手，“探讨二者亲和与悖离的现象及其本质”。全书共十一章，皆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就数量而言，其所占有的材料与论证的角度、层次，显然比我的文章要丰富得多；就质量而言，冯著研究与论证的深入程度，也是我远不能及的。

冯著十分重视汉初以来政治、文化环境的转变，对作家主体的影响。如冯著第二章论汉代经学家与赋家的关系，首先论汉初诸侯养士成风，附翼之士因此有相对的人身自由与思想自由。其次论继文景削藩以后，武帝特制定“左官律”、“附益法”，引导和强制士人与诸侯分离，转向为朝廷服务，士自此彻底丧失人身与思想的自由。再次论述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制度，“以经学取士”，士人皈依经学，从而导致赋家的经学家化。由汉代士人的转型，论及赋家与经学家的关系，冯著比过去的论述，更加细致深入。

如果说分析赋家经学家化的原因，冯著并未在实质上超越前人，因经学而造成赋家的内在矛盾，并影响其赋的创作，则是冯著的独见。赋家的经学家化，只是现象的一个方面。在本书的第七章，作者认为，大一统是经学尤其是《春秋》公羊学的核心理论，可分为形而上之哲学大一统和形而下之政治大一统两个层面，二者的统一是经学的最高追求。汉代赋家普遍具有大一统的意识，《七发》特别是《子虚》《上林》对大一统的歌颂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但大一统本身又是一种专制制度，它与士人所追求的个体独立和人生价值有着本质的冲突。作为汉代士人的一部分，汉代赋家普遍感受到了一种来自大一统的压抑、困窘，汉赋因此有了“悲士不遇”主题的作品。汉赋的“悲士不遇”，除了以抒情为主的贾谊《吊屈原赋》、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一类的骚体赋，更有以“论难”为主的散体赋，如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前者集中表现了汉代大一统对士人的压抑和摧残，后者的思想感情却更为复杂。赋家真诚拥戴大一统，视战国为乱世，视纵横家为名利之徒，同时又通过战国诸侯并立与汉代大

一统的对比，流露出自己对战国士人特别是纵横家的向往之情，以及对自身处境的强烈不满。无奈之下，他们或顺从于命运，或以安贫乐道、著书立说的方式，缓解自己与大一统的冲突。对作家主体在经学环境下的内在矛盾，对“悲士不遇”赋主题的界定及其意义的论述，冯著有如此系统的论述，此前的论著，似不曾有过。

对于经学理论的内在矛盾并由此影响于汉赋，作者更有进一步的揭示。礼乐是经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作者分别考察了汉赋的“三大题材”（苑囿畋猎、宫殿台榭、音乐歌舞）与礼乐的关系，认为汉赋历来被批评的“欲讽反劝”，是根源于经学礼乐观自身的矛盾。在冯著的第九章，作者认为经学的礼乐观与汉代的伦理政治密切相关。汉赋描绘苑囿之大、畋猎之壮；宫殿台榭之高、之多、之丽；音乐歌舞之哀、之乐、之幻，目的既在讽谏天子过分的游乐，同时更不由自主地表现出自己对巨丽之美的向往与追求。汉赋这一主题背离的现象，与经学理论在面对权力时所具有的矛盾同构。

由以上数例可知，冯著讨论汉赋与经学的关系，立足于“探讨二者亲和与悖离的现象及其本质”，研究与展现两者之间的逻辑过程，其结论因之有极强的说服力。这正是我想做而尚未做到的。我相信以读者的慧眼，还能从中发现许多精彩的议论。

赋学还有很多课题有待深入研究。良方正值壮盛之年，本书只是他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我们随时期待他带给赋学界的又一个惊喜！

万光治

2004年5月

目 录

序.....	万光治(1)
--------	--------

引 言.....	(1)
----------	-----

第一章 走向经学.....	(5)
---------------	-----

一、经学意识的自觉	(5)
-----------------	-----

二、汉初思想文化的历程	(12)
-------------------	------

(一)政承秦制	(13)
---------------	------

(二)黄老政治	(17)
---------------	------

(三)“过秦”思潮	(23)
-----------------	------

(四)儒学的延续	(28)
----------------	------

(五)综合趋势	(34)
---------------	------

(六)新的抉择	(38)
---------------	------

三、经学的成立及其影响.....	(42)
------------------	------

(一)董仲舒上《天人三策》	(43)
---------------------	------

(二)武帝置五经博士,为博士置弟子.....	(48)
------------------------	------

第二章 赋家与经学家	(55)
------------------	------

一、汉初士人的自由身份及其丧失.....	(55)
----------------------	------

2 汉赋与经学

(一) 诸侯卿大夫的养士之风和士人的自由	(55)
(二) 士人的转型	(59)
二、赋家的经学家化和经学家的赋家化	(62)
(一) 赋家的经学家化	(62)
(二) 经学家的赋家化	(71)
 第三章 汉赋文体源流辨析与经学	(74)
一、汉赋、楚辞与《诗经》的对接	(74)
(一) “赋者，古诗之流也”	(74)
(二) “骚自《诗》出”	(79)
二、汉赋三体的源流	(82)
(一) 诗体赋的源流	(83)
(二) 骚体赋的源流	(86)
(三) 散体赋的源流	(88)
三、经学对非正统文化的排斥	(91)
 第四章 汉赋三体的盛衰与经学	(98)
一、汉初的骚体赋	(98)
(一) 汉初骚体赋兴盛的楚文化背景	(98)
(二) 汉初骚体赋与经学的悖离	(102)
二、汉初的诗体赋和散体赋	(108)
(一) 汉初诗体赋的兴盛与藩国享乐游戏之风	(108)
(二) 汉初诗体赋与经学的乖异	(109)
(三) 《七发》——汉代散体赋的滥觞	(113)
三、散体赋的繁荣与经学隆盛	(116)

第五章 汉赋的讽谏精神与经学的政治批判性····· (122)

一、经学的政治批判性····· (122)

(一)在道统与政统之间····· (122)

(二)《春秋》公羊学的政治批判性····· (125)

(三)董仲舒天人理论的政治批判性····· (129)

二、经学和汉赋的讽谏精神····· (133)

(一)“礼有五谏,讽为上”····· (133)

(二)“以三百五篇当谏书”····· (136)

(三)“赋者,将以风也”····· (140)

第六章 汉赋的颂美意识与经学的意识形态化····· (145)

一、经学的意识形态化····· (145)

(一)走向意识形态化的儒学····· (145)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经学····· (149)

(三)经学的忌讳化····· (162)

二、雅颂传统与颂汉风尚····· (169)

(一)《诗经》的雅、颂与颂美····· (170)

(二)颂汉之风····· (174)

(三)汉赋的颂美意识····· (177)

第七章 汉赋与经学的大一统观念····· (182)

一、《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学说····· (182)

二、大一统观念与汉赋····· (187)

(一)汉代赋家普遍的大一统心理和对大一统的
歌颂····· (188)

(二)汉赋的“悲士不遇”主题····· (195)

第八章 汉赋与经学的圣王理想	(216)
一、内圣外王说	(216)
二、汉赋的圣王理想	(223)
(一)汉赋之“过秦”——一个圣王理想的反面 教材.....	(223)
(二)汉赋对汉代帝王的圣王化.....	(226)
(三)在现实和理想与劝和讽之间.....	(243)
第九章 汉赋与经学的礼乐理念	(247)
一、汉赋的“归之于节俭”与礼乐	(247)
二、苑囿田猎之赋与礼乐	(252)
(一)礼乐与苑囿田猎之制.....	(252)
(二)汉赋之“壮语田猎”.....	(258)
三、宫殿台榭之赋与礼乐	(266)
(一)礼乐与宫殿台榭之制.....	(266)
(二)汉赋之“高谈官室”.....	(269)
四、音乐舞蹈之赋与礼乐	(276)
(一)礼乐与雅乐、俗乐之辨	(276)
(二)汉赋之“极盛媚之声色”.....	(282)
五、汉赋的“巨丽”之美与礼乐	(293)
第十章 汉赋与经学的灾异祥瑞说	(300)
一、从先秦到汉代的灾异祥瑞说	(300)
(一)从远古到邹衍的灾异祥瑞说.....	(300)
(二)经学对灾异祥瑞说的理论化.....	(303)
(三)灾异祥瑞说对汉代政治的影响.....	(305)

二、灾异说与汉赋	(309)
(一)灾异说与贾谊的《旱云赋》.....	(309)
(二)灾异说与汉代赋家对外戚宦官专权的 忧患.....	(311)
三、祥瑞说与汉赋	(319)
 第十一章 汉赋的转型与经学的衰颓	(330)
一、经学和散体赋的衰颓及其原因	(330)
(一)经学陵替和散体赋的没落.....	(330)
(二)经学和散体赋衰颓的原因.....	(332)
二、士人与大一统政治的疏离和老庄思想的崛起	(342)
(一)从士人的群体自觉到个体自觉.....	(342)
(二)儒道调合.....	(347)
三、汉赋的抒情化	(350)
(一)两汉之际的抒情赋.....	(350)
(二)东汉中期后期的抒情赋.....	(355)
 主要参考书目	(373)
 后 记	(376)

引言

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雄霸文坛四百多年，成为“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① 经学在中国古代一直是一门显学，汉代更被称为经学的昌明和极盛的时代。但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汉赋和经学都备受冷落。经学曾经被视为封建思想的载体，尤其是汉代的今文经学更被简单地看成麻醉人民思想的神学；汉赋则被加上了“宫廷文学”、“形式主义文学”等等恶谥，经学和汉赋研究双双陷入沉寂之中。近二十余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热的持续不断，文学观念的转化和文学研究的深入，不少人认识到经学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汉赋是汉代文学的主流，汉赋和经学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然而，汉赋和经学研究又大多各自为阵。汉赋研究往往局限于汉赋本身，考镜源流、总结艺术特征、揭示审美特色。经学研究又多从政治、哲学、思想、文化的角度着眼，几乎不涉及汉赋。虽然有部分研究者承认汉赋与经学有一定的关系，但或者把汉赋与经学对立起来，或者仅把经学置于汉赋的背景加以考察，未能全面系统地研究二者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之，无

^①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自序》，载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第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论是汉赋研究还是经学研究，虽作出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均囿于单一的视角，缺乏打通二者的力作。

本书主要从经学的角度解读汉赋。当代文学史家指出：“有了文化学的视角，文学史的研究才有可能深入。”^①正如魏晋南北朝玄学、唐宋佛学、宋明理学与当时的文学的关系一样，经学与汉赋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有时甚至是互为一体的。其实，从经学的角度去解读汉赋，既能比单一地从汉赋到汉赋对有些问题的认识更清楚、更准确，也能为汉赋研究开拓视野、更新观念，甚至对于认识文学与学术、政治的关系等等，也不无裨益。

例如，关于汉赋的“讽”和“劝”的问题，汉代存在着旷日持久的论争。追寻论争的根本原因，在于汉赋本来就与经学纠缠不清。汉代是经学的时代，经学既有一定的政治批判性，又被意识形态化，影响到汉赋创作和汉人的汉赋批评，就有了“劝”和“讽”的问题。明乎此，才能真正理解汉代的汉赋批评，读懂汉赋尤其是其中的散体大赋，并给它们一个准确的定位和评价。反观现代的一些汉赋研究，由于缺乏对汉赋与经学关系的准确把握和足够重视，要么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要么作空洞的抽象的处理，要么理解得相当偏颇，得出的结论自然会似是而非。不仅汉赋的“讽”和“劝”的问题是如此，而且在很多方面，汉赋与经学都是同体互生，难分彼此的。因此，若要深入地研究汉赋，必然绕不开经学

^①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1卷，第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这个壁垒。

基于上述的思考，本书集中讨论了汉赋与经学的关系，探讨二者亲和与悖离的现象及其本质。主要内容有：对汉赋和经学的发生、确立和解体进行总体的把握，勾勒了二者大致相同的运动轨迹；立足对汉赋源流、作家身份、体裁流变的分析，揭示了经学对汉赋的渗透和影响；从经学的政治批判性和意识形态化入手，论述汉赋的讽谏精神和颂美意识；从经学思想和汉赋内容的实际出发，分析了汉赋文本对经义具体入微的表现。经学和汉赋的关系还广泛涉及到汉代的政治、思想、哲学、文化心理等等，本书对相关的内容也有所涉猎。通过认真勘察经学与汉赋的关系，本书认为：总体来说，在经学隆盛的时期，经学以其无与伦比的强势地位规范、控制着汉赋，汉赋亦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经学的规范、控制，虽然二者有时也有矛盾，但合一是主要的。

经学是一个庞然大物，汉赋亦是一个复杂的文学现象，二者的关系更是“剪不断，理还乱”。本书只是对这一课题的初步尝试，其中的有些观点是对前人的深化，有的则是作者的一己之得，正如刘勰所言：“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① 本书的观点和材料也许有不少偏颇和疏漏之处，希望能得到读者的批评。

最后尚须申明，本书之所谓汉赋，是一个“大汉赋”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对汉赋的范围尚有不同的看法，本书受郭预衡将汉赋分为“文体之赋”和“赋体之文”和万光治“汉代颂

^① 《文心雕龙·序志》。